

【国民经济】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过程的区制状态划分与转移分析

金晓彤, 闫超

(吉林大学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基于1979年1月至2009年8月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数据来具体刻画和分析我国消费需求增速过程的时间路径变化特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过程可以划分为“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和“高速消费区制”,消费需求增速过程在不同时域区间内处于不同的区制状态,并在部分区间内体现出显著的持续性特征。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在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态势,但是始终在“低速消费区制”与“适速消费区制”之间交替、徘徊。从2009年初至今,我国处于“适速消费区制”,因此,我国经济政策操作重点仍应该集中于扩大消费需求以期拉动总体经济增长。

[关键词] 消费需求增速; 区制转移模型; 平滑概率; 滤子概率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0)07-0036-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却持续低迷,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从1996年的47.7%减少到2008年的36.1%。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2008年的居民消费率已降低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最低水平。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无疑在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不能得以改善,则投资也难以从根本上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因此,消费需求不足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

近年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基于不同样本数据并采用不同计量研究方法对我国消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例如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万广华等(2001)以及杭斌和申春兰(2002)等通过对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与消费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罗楚亮(2004)学者运

[收稿日期] 2010-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难点和对策研究”(批准号09BJL0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批准号09YJA79008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制度变迁与农民消费行为——中国农民消费行为演化的实证分析”(批准号450021230274)。

[作者简介] 金晓彤(196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闫超(1985—),女,吉林吉林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医疗和教育支出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收入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由于传统计量模型存在线性约束等方面的局限性,因此非线性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识别宏观经济运行及波动的阶段性问题,如 Hamilton (1989)、Tiao and Tsay (1994)、Skalin and Terasvirta (1999) 以及 Leamer and Potter (2003) 曾使用非线性方法研究美国、瑞典等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及波动等重大问题。在本文中,我们借鉴上述学者的思想,应用非线性计量方法对我国消费增长速率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居民消费增长速率曾出现过“明显加快”、“适中增长”以及“较为缓慢”的态势,这意味着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变化路径中很可能出现了显著的结构转变。尤其是自 2008 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我国经济发展陷入极为复杂的局面,这势必给我国消费增长带来新的难题。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来识别和分析我国消费需求增速路径的动态变化属性。具体而言,我们基于我国 1979 年 1 月至 2009 年 8 月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数据对我国消费需求增速进行测度,并运用表征经济意义更为合理的马尔科夫三区制转移模型来具体刻画我国消费需求增速波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以及“高速消费区制”,并进一步识别我国现阶段消费增长的具体发展特征。

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构建与参数估计

作为讨论的起点,我们构建消费需求增速序列的自回归模型,旨在考察不同时期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依程度,以及该模型对时间序列历史数据的拟合效果,从而判断该模型的预测能力 (Friedman and Kutter, 1992)。在此,我们可以将消费需求增速序列的时间序列模型具体表示为如下形式:

$$C_t = \mu + \sum_{i=1}^p \phi_i C_{t-i} + \varepsilon_t, \varepsilon_t | I_{t-1} \sim iid N(0, \sigma^2) \quad (1)$$

其中, I_{t-1} 表示 $t-1$ 时的信息集。在该模型中,我们假定自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误差分布的均值和方差都是固定常数。此模型表明,当期消费需求增速依赖于前 p 期的消费需求增速,然而此模型要求消费需求增速路径所具有的时间序列平稳性特征并非自然满足,在自回归模型中一旦出现结构转变,即可能伴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或经济体制的改变,从而使得模型的结构也发生相应的转变,这时如果仍旧采用测度稳定时间序列的计量模型,将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的误差较大,同时所获得的对数似然值变小。另外,简单的自回归模型只能描述经济现象中存在的某种线性关系,而无法全面考虑消费需求增速动态变化过程中可能还存在波动程度不同的消费需求动态过程,因此简单自回归模型不可能准确地刻画消费需求增速的数据生成过程。

鉴于此,我们根据 Hamilton (1989) 提出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引入简单自回归模型结构,从而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的消费需求增速模型:

$$C_t = \mu_{S_t} + \sum_{i=1}^p \phi_{iS_t} C_{t-i} + \varepsilon_t, \varepsilon_t | I_{t-1} \sim iid N(0, \sigma_{S_t}^2) \quad (2)$$

$$\mu_{S_t} = \mu_1 S_{1t} + \mu_2 S_{2t} + \mu_3 S_{3t} \quad (3)$$

$$\phi_{iS_t} = \phi_{i1} S_{1t} + \phi_{i2} S_{2t} + \phi_{i3} S_{3t} \quad (4)$$

$$\sigma_{S_t}^2 = \sigma_1^2 S_{1t} + \sigma_2^2 S_{2t} + \sigma_3^2 S_{3t} \quad (5)$$

其中,如果 $S_t = i, i=1, 2, 3$, 那么 $S_{it} = 1$ 且 $S_{kt} = 0, k \neq i$ 。在此模型中,我们假设在消费需求增速的动态变化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三区制”,并认为模型中所有参数均状态相依并由区制状态变量 S_t 控制,而模型三区制之间的转移概率满足离散取值的一阶马尔科夫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区制状态变量 S_t 的转移概率矩阵 P 表示为:

$$P = \begin{bmatrix} P_{11} & P_{21} & P_{31} \\ P_{12} & P_{22} & P_{32} \\ P_{13} & P_{23} & P_{33} \end{bmatrix} \quad (6)$$

其中, p_{ij} 代表区制状态变量 S_t 从 $t-1$ 时刻的 i 状态变迁到 t 时刻 j 状态的转移概率, 且 $p_{ij} = Pr[S_t=j|S_{t-1}=i]$, 并满足 $\sum_{j=1}^3 p_{ij} = 1, i, j = 1, 2, 3$ 。

在此, 我们遵循 Hamilton (1989) 的观点, 来估计本文所构建的模型, 概括而言, 我们通过推导 C_t, S_t 和 S_{t-1} 基于过去信息集 I_{t-1} 条件下的联合分布密度, 可以获得边际分布以及对数似然函数值, 同时可以获得滤子概率和平滑概率值。

三、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路径的状态划分与转移检验

我们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 1979 年 1 月至 2009 年 8 月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数据, 计算得到消除季节趋势的同比增长率数据, 并以此时间序列数据描述和分析我国消费需求增速的动态属性, 识别和检验我国经济消费需求增速波动中呈现的基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我国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http://db.cei.gov.cn>)。文中所涉及的所有程序由 Gauss 9.0 以及 OX 语言完成。图 1 给出了我国消费需求增速的时间动态轨迹, 其中消费需求增速的周期成分由 H-P 滤波方法获得, 柱形图表示消费需求增速的周期成分, 即消费需求增速与其趋势成分之间的差距, 表征消费需求增速的波动程度。

由图 1 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的 30 年以来, 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率经历了五次显著的波动过程, 分别在 1982 年、1986 年、1990 年和 1999 年达到低谷, 并于 1980 年、1985 年、1988 年、1995 年和 2006 年达到峰值, 同时, 我们能够看到自 1996 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 我国消费需求体现出较为短暂的蛰伏期, 直到 2000 年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又逐渐出现了缓慢的攀升势头。然而受 2007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再次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虽然图 1 初步显示了我国消费需求增速的动态路径, 但是从此图中我们尚无法准确刻画消费需求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发生结构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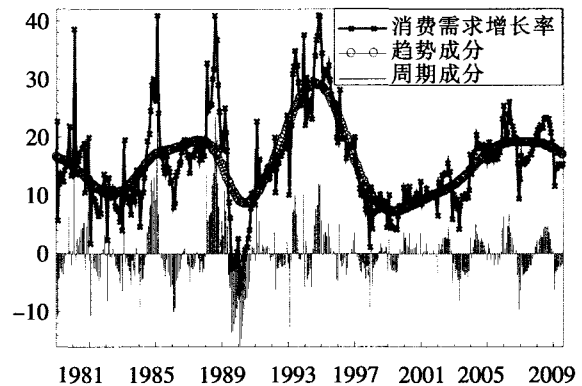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的时间动态轨迹

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本文所构建的马尔科夫三区制转移模型进行估计, 我们能够得到模型各参数的估计值、对数似然值、滤子概率以及平滑概率序列等计量结果。表 1 给出了滞后一阶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 我们发现, 各参数的估计值均合理而显著, 同时, 基于不同区制设定下, 模型的均值参数、自回归系数以及方差之间都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 这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三区制”特征。具体而言, 对均值系数来讲, 模型在“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以及“高速消费区制”设定下, 均值参数分别为 1.0243、3.9610 以及 8.7231, 这与模型中关于不同区制的均值设定思想相吻合, 即“低速消费区制”中的均值最小, 而“高速消费区制”中的均值最大。另一方面, 就方差估计值而言, 模型在“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以及“高速消费区制”设定下, 方差估计值分别为 1.3054、6.2540 以及 4.2094, 我们发现, 我国处于“低速消费区制”时的波动性最小, 而处于“适速消费区制”时的波动性最大。最后, 通过观察模型转移概率矩阵的估计结果, 我们发现, p_{ii} 较 p_{ij} 的概率值更大,

其中, $i, j=1, 2, 3$, 此外, 相比较, p_{22} 的概率值最大, 这意味着, 我国处于“适中消费区制”时具有最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表 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μ	1.0243**(0.2678)	3.9610*(2.4714)	8.7231**(1.9583)
ϕ_i	0.9346**(0.0171)	0.8351**(0.0982)	0.1848*(0.1936)
σ	1.3054**(0.1019)	6.2540**(0.6088)	4.2094**(0.5421)
转移概率矩阵	$P = \begin{bmatrix} 0.8663^{**} & 0.0039 & 0.1660^{*} \\ 0.0562^{*} & 0.9657^{**} & 0.0000 \\ 0.0775 & 0.0304 & 0.8340^{**} \end{bmatrix}$		
对数似然值	-935.1923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括弧中数值为对应参数的标准差。

图 2、图 3 和图 4 分别给出了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在 $S_t=1$ 、 $S_t=2$ 和 $S_t=3$ 处取值的平滑概率, 它们分别刻画了消费需求增速在 $t=1, 2, \dots, T$ 时刻所处状态发生转移的概率。在图 2 所示区间中,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处于“低速消费区制”(处于区制 $S_t=1$ 的概率 $Pr(S_t=1|I_t) > 0.5$)。在图 3 所示区间中,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处于“适速消费区制”(处于区制 $S_t=2$ 的概率 $Pr(S_t=2|I_t) > 0.5$)。而图 4 所示区间中,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处于“高速消费区制”(处于区制 $S_t=3$ 的概率 $Pr(S_t=3|I_t) > 0.5$)。同时, 平滑率也说明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进程中, 消费需求过程确实发生了结构转变, 即消费需求增速在“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和“高速消费区制”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相互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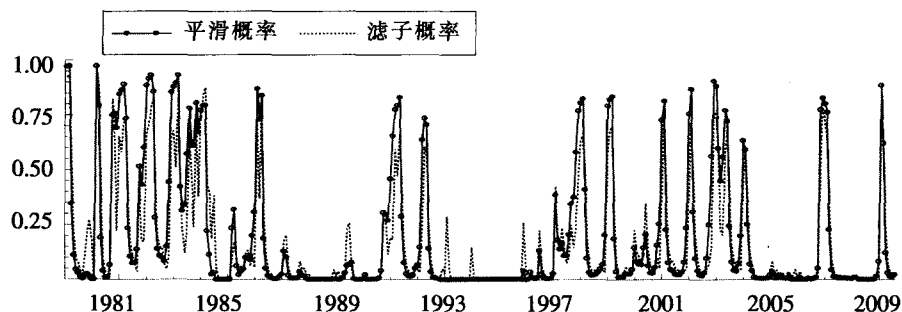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低速消费区制”轨迹 ($S_t=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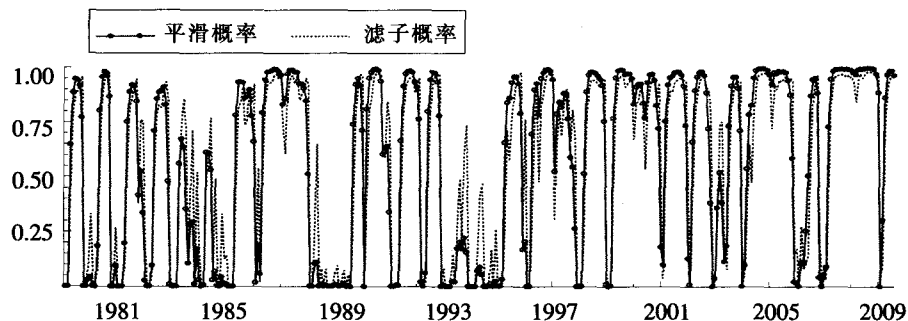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适速消费区制”轨迹 ($S_t=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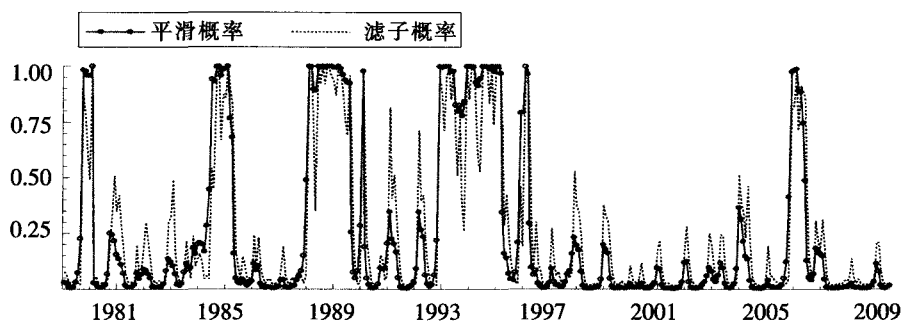


图4 我国“高速消费区制”轨迹 ($S_i=3$)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均值参数、自回归系数以及方差估计值在不同区制下的差异很大,并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本文所采用的马尔科夫三区制转移模型能够准确刻画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过程当中存在显著的“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和“高速消费区制”。同时,模型估计结果还能够标示出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在不同区制下的持续期。由期望持续期公式 $1/(1-p_{ii}), i=1,2,3$, 可以计算得到“低速消费区制”的持续期为 7.4794 个月、“适速消费区制”的持续期为 29.1545 个月,而“高速消费区制”的持续期为 6.0241 个月(p_{ii} 值在表 1 中给出)。这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在不同阶段的持续长度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特征,此“非对称性”具体表现在其周期阶段既有不同的持续期,同时也具有不同的转移概率。此外,我们发现“适速消费区制”仍然在我国消费需求增速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是目前我国消费需求增速所处的阶段。

从图 2 中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低速消费区制”都非常短暂,持续期大都为 2—4 个月,主要集中在出现在 1981—1984 年以及 1998—2004 年两个时域区间。最近的一次“低速消费区制”发生在 2009 年初,持续期为 2 个月。如图 3 所示的“适速消费区制”则表现出明显的密集型特征。其中,1985—1987 年以及 1990—1992 年期间,分别出现了两次时间较长的“适速消费区制”的持续期,而从 1996 年至今,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几乎主要处于“适速消费区制”,即该区制概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与表 1 中转移概率矩阵的计算结果相一致。从而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增速在绝大多数时域内都处于“适速消费区制”,尤其是 2009 年 4 月至今我国消费需求增速仍处于“适速消费区制”当中。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消费需求增长呈现出较为平稳的态势。图 4 描绘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处于“高速消费区制”的平滑概率和滤子概率分布轨迹。具体而言,在全样本区间内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共有五次集中体现出高速消费特征。分别为 1979 年 10 月至 1980 年 2 月、1984 年 7 月至 1985 年 4 月、1988 年 2 月至 1989 年 8 月、1992 年 12 月至 1996 年 3 月以及 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5 月。可以看出,我国的高速消费主要集中于 1979—1996 年期间,而从 1996 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只在 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5 月经历了短暂的高速消费增长,而其他时域内则未曾出现过“高速消费区制”。

四、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路径区制转移原因探析

为了探究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发生区制转移的深层原因,我们将对我国消费增速马尔科夫区制转移轨迹以及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上文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过程当中出现了“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与“高速消费区制”,通过对 3 个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图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从 1979—1987 年期间我国主要处于“低速消费区制”和“适速消费区制”,1988—1996 年的时域范围内,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轨迹则主要位于“适速消费区制”与“高速消费区制”,而从 1997 年至样本区间结束,我国的“适速消费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只在部分时域出现了短暂性的“高速消费区制”。为了更容易梳理和透析出影响长期消费

增长的内在因素及作用机理,我们依据消费增长速率的阶段性特征,用内涵更为宽泛、期限结构更为延长的时间区域来划分和界定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轨迹,即1979—1987年为第一阶段,1988—1996年为第二阶段,而从1997年至样本区间结束为第三阶段。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在30年的时间跨度中实现了传统的商品产品经济向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等经济形态的转变,但事实上经济增长是通过社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总量经济行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因素、名义经济和实际经济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为此,我们试图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发生区制转换的阶段性变化。

(1)通过图2和图3可以看出,在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轨迹的第一阶段我国主要处于“低速消费区制”和“适速消费区制”。1981—1984年间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路径集中出现了“低速消费区制”,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国务院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总额40亿元的国库券,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做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直到1985年才允许居民对国库券进行贴现。国库券的发行采取面向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行政摊派的形式。这虽然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硬性摊派的国库券占据了居民收入的较大比例,从而导致我国1981—1984年消费需求整体呈现下滑趋势。而我国居民消费增速轨迹在1985年发生了区制转移,1985—1987年间,我国居民消费增速主要处于“适速消费区制”。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有企业开始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开始由过去指令性计划的生产与调拨逐步向市场引导企业的方向转变。这些变化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和运行格局,使我国经济中被束缚的巨大活力得到了激发。从实证结果可以反映出在这段时间我国居民消费增速较上一时期相对加快。

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轨迹的第一阶段是我国对经济发展道路的初期探索,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初步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过程。这一阶段从供给不足、需求过剩发展到投资扩张、供给扩张并最终引致消费需求的扩张。伴随着市场体制因素和经济制度因素的时代变迁,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供给短缺、经济结构扭曲,以及传统的思想约束都在悄然发生转变,从而不仅实现了由总供给冲击推动的消费扩张,也为巨大的经济跨越和剧烈的经济波动埋下了伏笔。

(2)在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轨迹的第二阶段交替出现了“适速消费区制”与“高速消费区制”。由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双重体制并存,我国在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1988年我国首先出台住房商品化实施方案,继而又推出一系列物价改革措施,对部分商品实行浮动价格。1988年我国全年商品零售总额达到7440亿元,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了18.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3%。在这次严重通货膨胀影响下,消费需求极度膨胀,呈现出急速上升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格局的主要来自经济的总供给方面,逐渐活跃并逐步放大规模的社会总供给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该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总供给方面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使得某些供给面形成的瓶颈因素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都出现了高速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在软约束下开始迅速膨胀。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曾经几十年缓慢增长的收入水平,也伴随着社会产品的扩张而开始快速增加起来,不断增加的收入和日渐盈余的供给,使得消费市场出现了空前繁荣,也出现了后来人们经常谈及的“抢购风潮”。

总供给能力的快速形成和总需求能力的突然释放,使刚刚处于价格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市场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扭转此次消费过热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将工作重点转向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缩减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消费基金,控制货币发

行,积极推进价格、工资及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这次整顿改革很快取得成效,商品零售价格迅速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到了1992年,在经过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和大量货币投放以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产业改造获得了重大进展,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从供给短缺逐步转变为供给过剩,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供给能力已经达到了社会需求的总量要求。1992—1996年期间,我国社会供给能力继续扩大,经济运行出现了高投资、高物价、高货币投放、高进口以及金融秩序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的现象。1993—1995年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曾高达24.1%。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水平和扭转经济过热局面,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在财政方面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在金融体制方面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实现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有效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于该阶段政策作用效应比较灵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96年成功下降到8.3%,国民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

这一阶段由社会总供给从短缺到过剩的急速扩张带动了总需求的极度膨胀,继而经济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共同作用下,使得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实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艰难推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都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社会条件和市场条件并不成熟,更高的消费结构形成需要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制约了收入层次的升级,同时我国消费阶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家庭难以实现消费增长,从而导致需求和供给没有长久地处于平衡增长状态中,经济波动以及消费增速动态区制过程的更迭交替也随之显现。从图3可以看到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动态轨迹在1996年之前呈现出三区制频繁更替的态势。

(3)从1996年开始的第三阶段,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几乎主要处于“适速消费区制”,只在部分时段区间出现了较为短暂的“低速消费区制”,这说明我国“适速消费区制”概率保持相对稳定,也与表1中转移概率矩阵的计算结果相一致。在第三阶段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进入了深化时期,加入WTO更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同国际接轨,因此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步入了新时期。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期高速增长以后的调整期,体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调整,实现了从全面供给短缺到局部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也导致了部分部门经济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在此期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出口贸易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我国呈现出“低速消费区制”的态势,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受到“非典”蔓延的打击,而2006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攀升与股市价格暴涨,使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再次出现短暂的高速消费增长。但我国经济运行体现出抵御重大外来冲击的能力,居民消费增长速率依然保持在“适速消费区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进入2007年以来,伴随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最终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是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之后出现的第一次全球化金融危机。面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得本轮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伊始,我国的管理层面以及市场形态都产生了及时的反应,我国经济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刘金全等,2009)。但是,可以说随着第三阶段的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就已经由最初的总供给扩张以及后来的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进一步转变为以总需求为主导因素的时期。虽然在这一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平稳发展,主要处于“适速消费区制”,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居民消费依然面临消费增长迟缓和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尤其在当今总需求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的“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更要重视加强消费需求管理以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健性。然而,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一方面受到收入水平不高和贫富差距过大的制约,另一方面,在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由于第三产业的滞后发展,我国医疗保障体制的变迁、教育支出的增长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等变化,使居民收入不仅要考虑日常的消费支出,同时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增加对未来不确定支出的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当期消费,限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

五、基本结论与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 1979 年 1 月至 2009 年 8 月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刻画并检验我国消费需求增速动态过程当中存在的显著“三区制”特征,即“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以及“高速消费区制”三个代表性阶段,并最终获得如下两方面的重要结论: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的简单时间序列模型而言,本文采用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能够估计消费需求增速数据生成过程中结构变化的转移概率,并试图模拟该时间序列的内生变化特征,从而详细地给出任意时刻消费需求增速所处的区制状态、区制转移概率和区制持续时间,进而可以对比不同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状况,并判断和识别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效果。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出现了显著的结构转变,我们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计算得到的滤子概率和平滑概率,可以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速的动态轨迹分为“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以及“高速消费区制”。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 1996 年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之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呈现出“低速消费区制”、“适速消费区制”以及“高速消费区制”三区制频繁更替的现象,这映照出我国经济在此期间持续运行的能力较低,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和方法都处于尝试和摸索阶段,容易出现政策适时性和连贯性不强,致使居民消费需求的生长速度也呈现出跳跃性变化的特征。而在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适速消费区制”则占据了主导地位,只在部分时域区间内出现了短暂的“低速消费区制”,并且我国只在 2006 年经历了高速消费增长,而其他时域区间内则未曾出现过“高速消费区制”,尤其是进入 2009 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速始终处于“适速消费区制”,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经步入相对稳定和持久的时期,使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在近一段时域区间内体现出持续性特征,并且“适速消费区制”的持续期有明显加长的态势。

消费需求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虽然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始终保持逐年上升的态势,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却意味着我国居民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根据我国目前实际经济状况,并结合上文中我们对我国居民消费区制转移原因的探析,我们认为我国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率区制转移原因的分析,我们发现居民收入对于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具有显著影响,甚至能够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发生区制状态转移。而目前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较大,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实际收入较低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只能维持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水平上。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弹性较低,其消费需求已趋于饱和状态,较难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二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教育、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使居民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增加。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际支出与过去相比显著增加,这一方面导致了居民当期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得居民的未来消费预期增加,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致使居民消费增长迟缓。

依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率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的基础,是将消费欲望转化为消费需求的重要条件。增加就业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这不仅需要改善就业环境,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下岗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鼓励下岗和失业人员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同时,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提高低收入者和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努力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为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提供必要保障。另外,应该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如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

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二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步伐。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快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步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增加居民当期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对于未来不确定支出的预期。首先,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应尽量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尤其是加快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积极探索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针对不同群体增加不同的保障项目。其次,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等体制改革,增加政府对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能进一步促进消费需求的稳定合理增长,也才能够赋予经济发展持久的动力,为社会进步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Friedman B. M., Kutter K. N. Money, Income,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1992, 82(6).
- [2]Hamilton, J. D.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 Econometrica, 1989,57(2).
- [3]Leamer, E., and S. Potter. A Nonlinear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R]. Manuscrip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2003.
- [4]Skalin J., and T. Terasvirta. Another Look at Swedish Business Cycle, 1861—1988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999, (14).
- [5]Tiao, G. C., and R. S. Tsay. Some Advances in Nonlinear and Adaptive Modeling in Time Series[J]. Journal of Forecasting, 1994, (13).
- [6]杭斌,申春兰. 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及利率政策效果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 (12).
- [7]刘金全,随建利,闫超. 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取向[J]. 中国工业经济,2009, (8).
- [8]龙志和,周浩明. 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0, (11).
- [9]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 经济研究,2004, (4).
- [10]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01, (11).
- [11]袁志刚,朱国林. 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J]. 中国社会科学,2002, (2).

Regime Division and Regime Switch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Consumption Growth Dynamic Process

JIN Xiao-tong, YAN Chao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s of January 1979 to August 2009 of total retail sales of China social consumer goods growth rate, this paper uses Markov regime-switching model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growth rate of consumpt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estimation and test, dynamic process of growth in consumption can be classified as “low consumption regime”, “medium-speed consumption regime” and “high-speed consumption regime”.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belongs to different regime, and reflect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in some intervals. We find that consumption growth show a relatively stable situation after economy achieving “soft landing” in 1996, but it is always between the “low consumption regime” and “medium-speed consumption regime”. From early 2009 to now, China is in “medium-speed consumption regime”, so the economic policy operations still should be focused on promoting consumption to driv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consumption growth; Markov regime-switching model; smoothing probabilities; filter probabilities

[责任编辑:王燕梅]